

【史学史研究】

公羊学背景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姜 鹏

【摘要】历来质疑和维护《史记·孔子世家》体例合理性者都很多,将“公侯传国”作为“世家”体例的基本内涵,是干扰我们正确理解《孔子世家》的重要障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对《史记》文本经学性的认识。明末清初以来,不乏从《春秋》公羊学角度对《孔子世家》的写作意图作出解释者,但不够系统化。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史记》中因“作《春秋》”而具有超时代价值的孔子形象,主要来自董仲舒传授的公羊师说。唯有透过《史记》的《春秋》观,才能更好地理解《史记》的孔子观。《史记·孔子世家》也不是一篇单纯的历史传记,它与《陈涉世家》形成一个有机组合,共同承担着说明历史变化轨迹的任务,落实“通古今之变”中的“变”字。而这种历史变化轨迹描述,是与以公羊学为代表的西汉今文经学所建构的政治哲学相呼应的。唐代以后关于孔子、陈胜入于世家是否合理的争议,恰是在史学独立、公羊学衰微背景下产生的以史学思维替代经学构想的误解。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公羊学;董仲舒

【作者简介】姜鹏,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123~133

一、历代关于《史记·孔子世家》的争议

现存文献最早对《史记》作出系统性批评的是班彪。《后汉书·班彪传》载其论《史记》体例云:“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①这段文字首先是替司马迁总结一个“条例”,即何谓本纪、世家、列传其次,指出了《史记》四个“条例不经”的案例,即列入本纪的项羽、列入世家的陈涉、降为列传的淮南王刘长与刘安父子,以及刘长的另一个儿子衡山王刘赐。班彪的“条例”说影响很大,^②在世家体例上,班说侧重于爵位的传承性。后世很多学者在讨论《史记·孔子世家》时,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着重在传承性上作文章,形成了解说《孔子世家》的第一条思路。^③

刘知幾《史通》讨论纪传体裁,基本上就是以班

说为出发点。稍有不同的是,班彪尚未将《孔子世家》列入《史记》“条例不经”的范围,而刘知幾应该已经意识到,按班彪的标准,以孔子入世家也是失当的,故在《史通·世家》篇中,一方面追随班彪,强调世家主要适用于“开国承家”的诸侯,同时又增加了“世代相续”这一辅助标准,拓展了班说传承性特点的适用范围。有趣的是,在行文中刘知幾还是没有提《孔子世家》,仅仅批评了《史记》将陈胜列入世家的不合理性。清代释《史通》的浦起龙却受此启发,说道:

位孔子以世家,先儒非之(按:指王安石,说详下)。愚谓《史记》乃从其世及而世家之也,故叙后系独长,至十一传安国,而与己同时,继以子印孙驩而止。厥后褒成、褒亭、宗圣、奉圣、崇圣、恭圣、绍圣、褒圣、衍圣之封,与世无极焉。乃悟“世家”二字,千古唯孔氏颠扑不破。《史通》纠史,于孔子无缀词,其

亦有会于斯欤?^④

其实刘知幾的暗示无需等浦起龙识辨,在唐代即有回响。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在释《孔子世家》时都有刘说的影子。司马贞说孔氏家族“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继世象贤,诚可仰同列国”。张守节则云:“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家》。”^⑤最近的研究指出,司马贞与张守节同师吴郡张嘉会受《史记》学,则两人在解释《孔子世家》时意见一致实有渊源。^⑥几位唐代学者虽然是在维护《史记·孔子世家》的合理性,但事实上已落入班彪彀中。正因为班彪悬置了一个“条例”标准,他们才需要为《孔子世家》的“特殊性”辩护。这恰恰说明他们基本接受了班彪的标准。

后世学者中受班彪“条例”说影响,率先对《史记·孔子世家》提出质疑的是王安石。王安石在《孔子世家议》中说:

太史公叙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公卿特起则曰列传,此其例也。其列孔子为世家,奚其进退无所据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无尺土之柄,此列之于传宜矣,曷为世家哉?岂以仲尼躬将圣之资,其教化之盛,焉奕万世,故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极孳之论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而迁也自乱其例,所谓多所抵牾者也。^⑦

王说第一句话照搬班彪,并认定这就是《史记》的“条例”。稍后李清臣批评《史记》“世家孔子而不为传,使孔子与陈项争列,欲尊大圣人而反小之”,是王安石最初的同调。^⑧之后争议蜂起。南宋黄震的《黄氏日抄》、明代郝敬的《史汉愚按》,都在此基础上变化行文,或重申或微调了王安石的观点。^⑨然正如上文已指出的,无论是司马贞、张守节等人的辩护,还是王安石、李清臣等人的质疑,都是围绕传承性展开,区别在于这种传承性是否可以放宽到封疆列国

之外。至清末学者刘光蕡提出“唯德乃可以世其家”,也是传承性主张的分支。^⑩刘咸炘在《太史公书知意》中点评了不少前代关于《孔子世家》的议论,^⑪仍倾向于唐人的“代有贤哲,故为世家”说。^⑫

廖平的观点显得有点自相矛盾,他在《〈史记〉列孔子于世家论》中明确指出不能“据班氏以攻史公”,随后拈出“势”、“年”两字作为《史记》本纪、世家、列传的取舍标准,认为《史记》是“揽势之大者谓之本纪,阅年之久者谓之世家”,故项羽得入本纪而孝惠并于吕后。^⑬其实,以“阅年之久”作为世家的标准,仍在唐人窠臼中,且仍然解释不了陈胜何以能入世家。廖平是清末民初新一轮今文经学尤其是《春秋》学兴起的宗主,在这篇文章中他意识到了要突破《汉书》藩篱,却未将《史记》这一安排与他最熟悉的公羊学联系起来讨论。

阐释“世家”的第二条思路是强调贡献性与影响力的大小。这个模式可溯源至南宋学者林駟的《古今源流至论》。林駟说“子长以事之有大于列传,则系之世家”,在这一思路下分析了《孔子世家》、《陈胜世家》的合理性。林駟也注意到,汉初功臣中只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入世家,其他或有列传,或仅见于表,是因为萧、曹、张、陈“勋烈冠于群后,皆社稷之臣”。^⑭

现代学者中把这一观点申说周全的是徐复观。他在《论〈史记〉》一文的第五部分《〈史记〉构造之一:本纪、世家》中指出,要把《孔子世家》、《陈胜世家》乃至《项羽本纪》,和汉初的萧、曹、张、陈、周五世家合在一起理解,并体味同为汉初重要功臣,为何樊哙、酈商、夏侯婴、灌婴等人只能入列传?徐复观认为,从对汉初功臣的安排看,入世家还是入列传,是一种基于历史影响力的价值判断。项羽入本纪,孔子、陈胜入世家,与此同理。^⑮笔者认为,这一思路跳出班彪“条例”说的影响,从《史记》本身理解《史记》,很有启发意义。但仍有可推进的空间。比如我们可以追问:孔子特殊的历史价值究竟是什么?司马迁对这一历史价值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受经学研究发达的影响,清代学者中涌现出理解《孔子世家》的第三条思路。金倬基《读〈史记·孔子世家〉书后》云:“史有定例,有创例。凡公侯传国者曰‘世家’,定例也;置孔子于‘世家’,创例也。此正子长史例之精。”^⑧按,西汉经学中,公羊、谷梁两家解《春秋》均有“例”与“变例”之说,金倬基以“定例”、“创例”平衡《孔子世家》,或是受此影响。但以“公侯传国”定义“世家”,显然又是蹈袭班、王旧轨。

清代学者姜宸英、袁枚等人从“尊周”角度为《孔子世家》的成立作辩解。姜宸英排比《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述《晋世家》、《越王勾践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所作之由,发现司马迁都从“尊周”的角度对这几个诸侯国进行了肯定,而其序《孔子世家》也有“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以正”的说法,于是得出结论:“附孔子于世家者,非尊孔子也,推孔子之心,以明其始终为周之意……而尊周者诸侯之事也,故上不得比于本纪,而下亦不得夷为列传也。”^⑨这个观点得到袁枚的赞同。^⑩姜氏的观点是否契合司马迁原意,尚有疑问。首先“尊周”并非作世家的必要条件,除《孔子世家》外,《史记》中先秦世家共十六篇,姜氏所举“尊周”例证仅六家。其次,姜氏认为“尊孔”仅仅是“尊周”的工具,是昧于《史记》写作的学术史背景。第三,这个逻辑无法解释同列世家的陈胜。

笔者认为,第三条思路中最值得重视的分支是从公羊学中寻找答案的观点。黄淳耀认为《孔子世家》有“据鲁亲周”之意,^⑪何焯也说:“论来孔子只合作列传,太史公自据素王之说。”^⑫但黄、何两氏都没有作深入探讨,对《孔子世家》如何体现公羊学内涵语焉不详。最值得重视的是苏舆提出的“史公尊孔子,立世家”是得自于董仲舒的说法。^⑬笔者认为此说最切要害,直接指出《史记·孔子世家》实为董仲舒一系公羊说影响下的产物。苏舆的观点散见于为《春秋繁露》各篇所作的疏解中,尚需进一步系统化整理。

本文打算在前有研究基础上着重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史记》所建构的孔子形象,其学理依据是什么?这与理解《孔子世家》有何关系?二是《孔子世家》和《陈胜世家》是相互独立、各具特殊性的吗?希望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司马迁为孔子作世家的深层逻辑。

二、董仲舒与《史记》中的孔子形象

正如朱维铮师所提醒,我们应当区分“孔子的历史”与“历史的孔子”。^⑭周予同先生说:“两汉以来的孔子只是假的孔子而不是孔子的真相。”^⑮笔者倾向于把“假的”替换成“建构”。《史记·孔子世家》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份孔子传记,上距孔子之歿近四百年,其中一定蕴含了大量的乃至系统性的建构。建构的依据分两个层面,一是史料,二是据以组织这些史料的观念,而后者尤为重要。《史记》中的孔子形象有两个重要面相:一是为修复礼乐奔走于当时的孔子一是超越时代限制,以思想影响于后世的孔子。孔子的后一种面相,是通过其晚年修订六经实现的,其中在《史记》中地位最特殊、最频繁地被提到的是“作《春秋》”。相较于其他经典的编订,《孔子世家》不仅对“作《春秋》”的介绍篇幅最多,而且行文上单独展开,不与其他五经相连,在孔子晚年生活中独居重要位置。此外,《史记》全书多处提及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太史公自序》甚至含蓄地将《史记》写作比拟为“作《春秋》”。司马迁既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编纂《史记》的宗旨,其价值关怀必然也是超越时代的。通观《史记》可知,社会伦理、政治秩序,是这一关怀的核心部分。在《史记》处理过的历史人物中,能通过整理历史形成价值体系、表达政治理想,并为司马迁提供系统性思想养分的,唯有孔子。故司马迁试图将自己的写作与孔子“作《春秋》”联系起来,是有其逻辑的《春秋》也因此《史记》中拥有特殊地位。然而,与“作《春秋》”相关联的孔子形象是被建构出来的,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公羊学。^⑯司马迁既然接受了“作《春秋》”的孔子,必然也受到了相应学理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从《史记》的《春

秋》观入手以理解《史记》的孔子观,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研究《史记》的学者都会注意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与壶遂关于《春秋》的对话,也有学者将这段对话视为司马迁“继《春秋》”之志的夫子自道。^⑤问题是这里的《春秋》具体内涵何指?是《春秋》经文本身,还是某一家解释《春秋》的传文、师说,还是有其他更广泛的理解?历来异说纷纭,早在中古《史记》注家中既已体现出这种分歧。如对话中司马迁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裴驷《集解》引张晏说:“《春秋》万八千字,当言‘减’,而云‘成数’,字误也。”裴驷随即反驳道:“太史公此辞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经》、《传》凡有四万四千余字,故云‘文成数万’也。”^⑥裴驷解释得很清楚。司马迁这段话起首云“余闻董生曰”,自下“周道衰废”迄“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虽然也杂引其他典籍,但主题思想明显来自于《春秋》公羊学,言辞文句或与《公羊传》契合,或与《春秋繁露》相应。甚至壶遂问话中所云“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也是公羊学说特有而又最基本的内涵。吴忠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对这篇文字每句话的来源、含义都有详细注解,可资参考,文繁不举。^⑦

唐代学者却又把裴驷已经解决的问题搅乱了。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小、颜云‘史迁岂以《公羊传》为《春秋》乎’?又《春秋经》一万八千,亦足称数万,非字之误也。”^⑧针对这一观点,吴忠匡说:“古人为学,贵师承,又汉人引据,往往经传不别。史公受《春秋公羊》说于董生,故《史记》称《春秋》,多指《公羊》。”在列举《史记·宋世家》、《淮南王列传》、《匈奴列传》三例,所云《春秋》皆指《公羊传》而言之,吴氏又说“不特史公,汉人著述中所举《春秋》亦多谓《公羊》。”如《淮南子·说林》、《汉书·陈汤传》者是。^⑨

笔者认为裴驷、吴忠匡的解释是正确的。脱离传文与师说,文辞简奥的《春秋经》是无法得到理解的。进一步说《春秋》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政治主

张,本身就是由传文与师说建构的。故在汉代,根本不存在独立于传文与师说之外的《春秋》学。不唯《春秋》学如此,其他儒家经典都是这个情况。有学者总结道:“汉人之治经,实治传也。”^⑩此说良是,盖舍传而经之意义不备。司马迁也必假传以通经,获得相应的观念体系。而在西汉前期,经学立于学官者少,宣帝之前除《诗经》以外皆一经一师,《春秋》唯有公羊师说,^⑪故形成引据中经传不分的传统。

《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讲述《陈涉世家》撰述之由时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⑫吕思勉注意到了这句话,认为“史公以《春秋》之作比汤武”。^⑬严格来讲,应该是以《春秋》之作比汤武之作,在这里《春秋》具有明显的拟人化特征。吕思勉关注的是上下两个分句间的对称,在这句话里还有另一种对称形式,即上分句中桀、纣与汤、武对,下分句中周与《春秋》对。“周”可以理解为周王朝,也可以理解为周朝的礼乐制度。无论将《春秋》人格化、拟王朝化,或将其视作可与周朝礼乐等量齐观的“一王之法”,都是《春秋》公羊学的专有特征,而且是来自董仲舒。^⑭

学者已指出,虽同为公羊学,但著于文本的《公羊传》与董仲舒学说之间有着明显差别。如孔子改制、以《春秋》当新王诸说《公羊传》无明文。这些学说主要见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一篇尤为核心,如云:“《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因此要绍夏、新周、故宋,形成殷、周、《春秋》新三统《春秋》继周道之弊而兴起,根据文质交替规律,需损周文而益殷质。^⑮这就是《春秋》拟王朝化的出处。然而《春秋》毕竟是一部著作,假以明道的事迹托付于鲁史,故必须“缘鲁而言王义”,又有“王鲁”之说。^⑯这就是《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作《春秋》是“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的依据。^⑰东汉末年何休作《公羊解诂》,将董仲舒的这些学说纳入对《公羊传》的解释中,丰富了《公羊传》的内容。^⑱汉代经学家都尊奉孔子,但绝大多数采取为经典作传疏的形式阐明孔子某个具体理念,很难通过这种形式建立

孔子的人格形象。留下来的汉人传经文献中,唯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脱离经典文本,采用论说形式,这也更有利于刻画孔子的人格形象及其思想的系统性。综上所述《史记》所运用的《春秋》学说,以及因“作《春秋》”而具有超时代思想史意义的孔子形象,主要就是来自于董仲舒。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把公羊学与谷梁学、《左传》做个对比。有学者总结道:“三传唯《公羊传》有‘孔子作《春秋》’之明文。”^⑧至于东汉古文家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⑨是今古文纷争扰扰、师说混淆以后的事,非司马迁所能知。杜预亦托“或曰”云:“《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⑩孔颖达指出一个问题,单就何休注《公羊传》文本而言,也是没有孔子作《春秋》明文的“孔子之作《春秋》”明文见于另一个《公羊传》文本,即东晋时期的孔衍本。^⑪细按何注《公羊》哀十四年传文,的确没有直接给出“孔子作《春秋》”字样,但传文明确讨论了“君子曷为为《春秋》”的问题,作出“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的解说,与《左传》、《谷梁传》哀十四年文下了无一字及于《春秋》者相去霄壤。^⑫更重要的是,董仲舒于此有明文,是司马迁见闻可及的文献。董仲舒对武帝第二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⑬

《史记·孔子世家》以获麟者为叔孙氏车子鉏商,与《左传》同,而《公羊传》但以采薪者获麟,不云名氏;且《史记》载孔子卒日为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亦与《左传》同,因启疑窦,或以为《史记》兼采古文家说。^⑭且把刘歆抄掇《史记》以成《左传》的偏激之见放置一边,就文本论文本,仍得不出《史记》此处采用古文的结论。如前文指出《左传》仅仅提供了鉏商获麟的事件性细节,并没有将此与孔子作《春秋》联系起来。《史记·孔子世家》则在行文中将鉏商获麟作为孔子作《春秋》的前奏,其间孔子对颜渊之死的悲叹颇与《公羊传》相应。《史记·儒林列传》则更紧密地将获麟与作《春秋》联系起来:“西狩获麟,曰‘吾道穷

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⑮一般认为汉代《春秋》学,今文家以麟至之后孔子作《春秋》,古文家则持《春秋》成而致麟之说。^⑯《春秋繁露·符瑞》:“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⑰《史记》叙事逻辑与董仲舒说相一致。古文家说见于孔颖达《春秋正义》引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卫反鲁而作《春秋》,约以周礼,故有麟应而至”,贾逵、颖容说并同。^⑱这是东汉以后学者的发挥诠释,是司马迁身后事。综此,即便司马迁在叙事上采用了《左氏春秋》的细节,仍不妨碍这样一个结论:《史记》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形象,是假借董仲舒的公羊学说成立的。这就是前文所云史料与据以组织史料的理念之间的差别。

在《史记》所述《春秋》是否包含了《左传》这一问题上,更容易引起解读混淆的,是《十二诸侯年表》这段序言: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⑲

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司马迁对《春秋》的理解,不仅仅来自公羊学,还受了《左传》的影响。^⑳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全文引,是想指出这段文字从文意上看,其实讲了两个层面的问题。“鲁君子左丘明”之

前,是第一个层面,讲孔子修《春秋》,典型的公羊说,“王道备,人事浹”更是直接袭用董仲舒的语言。^②“鲁君子左丘明”以下是第二个层面。在此《左氏春秋》(注意司马迁没有使用《左传》这个词)和《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是并列的,是与“史记旧闻”相关的各类衍生品,并不能说明司马迁相信《左传》是解《春秋》的,并从中获得了与公羊学不一样的《春秋》学理解。^③故皮锡瑞云:“《史记》称《左氏春秋》,不称《春秋左氏传》,盖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别为一书,不依傍圣经。”^④虽然多数现代学者无法接受康有为等人的说法,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的,但第一个建立《左传》与《春秋》之间联系的的确是刘歆,不能把它前挪至司马迁时代。^⑤《汉书·刘歆传》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⑥至于《史记》是否采用了《左传》的内容,学者间仍有分歧。笔者认为可以退一步来看,如上文所举鉏商获麟例,即便《史记》采用了《左氏春秋》的内容,也和《史记》摭摭其他“史记旧闻”一样,司马迁并不是经由《左传》理解《春秋》的政治学说以及孔子作《春秋》的意义的,且《左传》并未致力于勾勒出一个清晰的孔子形象。

故我们的结论是:(1)司马迁是透过公羊学理解《春秋》的,当《史记》以《春秋》学说为立论基础、发挥思想时,此《春秋》即是公羊学,这一点在学理上是可以锁定的,也是必须锁定的,否则会引起很多对《史记》的误解,也妨碍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史记》中的孔子形象。(2)《史记》据以勾勒孔子生平的史料,有《论语》、《左氏春秋》、其他经传,以及我们今天看不到的古史文献。而思想层面的孔子形象得以丰满,并被赋予超越时代的意义,是司马迁假借董仲舒的公羊学说达成的,即《史记》中的孔子形象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董仲舒。明乎此,苏舆所说的“史公尊孔子,立世家,又得之董生者”,才能找到落脚点,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史记·孔子世家》的成立,是遵循了怎样的体例与逻辑。

三、《史记·孔子世家》与《陈涉世家》的组合意义

有学者注意到,司马迁在写作体例上努力保持《孔子世家》与其他《世家》的一致性。如陈仁锡和李景星都注意到《孔子世家》屡在孔子年龄下叙事,相当于诸侯纪年。^⑦又,各诸侯《世家》往往在相应年份下记录其他诸侯国的重大事件,这一方法也被挪用至孔子身上。赵翼说:“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亦皆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重轻也。”^⑧笔者以为,这种错综互见的写法,其实是表的文字化。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中也逐一记载了孔子的重大活动,虽不能独成一行,但待遇与列国相埒。善读《史记》者都知道,表是《史记》真正的纲领,我们往往能从本纪、世家和表之间的紧密配合,看出司马迁思虑的周全和《史记》结构的缜密。与列国《世家》以及《十二诸侯年表》的呼应,体现出司马迁在安排《孔子世家》时,体例与逻辑是自洽的,关键是要找出这一安排的具体内涵。

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还会碰到一个问题:孔子作为春秋后期人物《孔子世家》为什么没有按照历史时序出现在春秋诸侯与战国诸侯之间,而是殿于先秦诸《家》之后?紧接《孔子世家》的,是被中古史评家们批评得更厉害的《陈涉世家》。司马贞说:“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将相竟灭秦,以其首事也。然时因扰攘,起自匹夫,假托妖祥,一朝称楚,历年不永,勋业蔑如,继之齐鲁,曾何等级。可降为列传。”^⑨司马贞一方面意识到了陈胜“首事”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却认为应将其降为列传。这说明司马贞根本没有意识到《陈涉世家》和上一篇《孔子世家》其实是一个组合,司马贞的这一“无意识”具有普遍性。清末学者陈玉树注意到《史记》将孔子、陈胜排列在一起的,不仅是世家结构,还有《儒林列传》的序论,他说:“太史公既于《自序》见意,复于《儒林传序》畅述其旨,首叙孔子次《诗》《书》,次及秦季焚书,次及陈涉为王,诸儒委质,次及汉兴诸儒修经习礼,其大指已昭若发蒙,而司马贞不悟,犹云宜降为列传,何其谬哉!”^⑩

笔者认为《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是一个不能拆分的组合,在整部《史记》中具有结构性意义。要明了这一点,首先需厘清公羊学对《史记》孔子形象的影响;其次,要回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这一动态大历史观中寻找孔子、陈胜的定位与价值,而不是相对静态地就孔子、陈胜本人的事迹讨论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司马迁将孔子、陈胜写入世家的意义。

公羊学为古今之变这一大历史中的孔子设计了一个角色,即以素王身份,通过“作《春秋》”为后世创制义法,皮锡瑞所谓“孔子功继群圣,全在《春秋》一书”。^④在公羊学的设计中《春秋》的目的是改革周道之弊,是继周道而兴的一王新法,所以有资格在王朝更替的三统循环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历史引进了一个新元素,原先夏(正黑统)、商(正白统)、周(正赤统)旧三统要发生变化,必须把夏朝挪出去,才能空出一个位置容纳《春秋》,此所谓“绌夏”;接下来就形成了商(正白统)、周(正赤统)、《春秋》(正黑统)这新三统,或者说新三王。按董仲舒的设计,从三王中挪出的,归入五帝;从五帝中挪出的,归入九皇;从九皇中挪出的,归入六十四民。随着历史的发展,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的具体内涵都会发生变化,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在周道未弊、《春秋》兴起之前,三王就是夏、商、周,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⑤《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紧接夏、商、周三代本纪,其实严格符合董仲舒的“三统”说推演,这也构成了司马迁所说“通古今之变”中的“古”。^⑥但历史的要害在“变”,是由“古”到“今”的过程。“今”是司马迁所生活的汉代,那么这个“变”主要就体现在由周向汉的过渡进程中。以司马迁所依据的公羊学来看《春秋》的作用就是衔接周、汉。《公羊传》哀十四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⑦《春秋繁露·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⑧汉人心目中的“后圣”自然是汉帝,董仲舒又说:

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颇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⑨

这段话里,董仲舒明确地将秦朝排除出治道统绪。对于汉初知识分子来说,抛弃秦政是通识。司马迁大段抄录贾谊《过秦论》作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的评语,也是这个意思。^⑩

孔子毕竟是有德无位的素王,他造的新法再好也需要人的行动来实现,所以需要有一套“革命”理论与之相配合。蒙文通说:

《齐诗》讲“革命”,《公羊》讲“素王”。但两者是不能分割的,不能孤立起来讲论的。很显然,如果没有“革命”来“易姓改代”,圣人如何能受命而王。故只讲“素王”而不讲“革命”,称王便失掉根据。反过来,如果没有“素王”的“一王大法”,“革命”便将无所归宿,故只讲“革命”而不讲“素王”,“革命”便失掉行动的目标。^⑪

齐《诗》和公羊都是齐学,公羊学者董仲舒、刘向引《诗》多齐义,是齐学内部诸经间确有会通处。刘邦正是因“革命”而起的后圣。辕固生与黄生在汉景帝面前讨论汤武革命是否合理,辕固生的最后一问就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司马迁在讲完这段故事后补了一句:“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⑫受命是公羊说,放杀是齐《诗》义,两者都源于《孟子》。^⑬

从孔子改制到刘邦受命,在历史发展的现实路径中,有秦、项、陈胜等因素需要正视。原始察终,尽其委曲的《史记》必须尊重这些事实并予以解释。^⑭《史记·太史公自序》论作《秦楚之际月表》曰:“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⑮而《秦楚之际月表》本文则说:“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⑯观史公文意《自序》中的“楚人”当即《月表》中的陈涉。

所不同的是《自序》作八年《月表》作五年。陈胜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七月起兵;二年(公元前208)六月楚怀王立;汉元年(公元前206)十月子婴降、义帝立、项羽称西楚霸王;汉五年(公元前202)杀项羽。若从公元前209年陈胜起事算起,到刘邦称帝,首尾八年,与《自序》合,故梁玉绳以五年为非。^④田余庆先生《说张楚》一文也注意到了这一点。^⑤笔者以为,所谓三嬗,若作动态观,由秦至陈胜的张楚为一嬗,由张楚至项羽的西楚为二嬗,由西楚至汉为三嬗,此则八年之说为合。若用五年说,从秦朝尾声公元前206年算起,到刘邦称帝为五年,中间没有陈胜,三嬗当指秦、西楚、汉三个政权,说似在两可之间。

至于田余庆先生说,在安排《陈涉世家》时“司马迁的思想是相当混乱的”,笔者不能同意。田先生说:“若是如司马迁所说尊重亡秦,则张楚之功不在项羽之下,虽立《陈王本纪》亦无可。”田先生忽略了一个细节,陈胜并没有彻底推翻秦王朝,在他去世的时候,秦的王号还在。推翻秦朝的是刘、项,所以《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系年是可以衔接的。若为陈胜立本纪,必插在《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之间,陈胜败而秦犹在,纪年如何衔接?《秦楚之际月表》也是旁行邪上以义帝元年续秦王子婴之末,以示纪年的可衔接性。^⑥田先生又说:“若从陈胜不继世而亡言之,比诸侯立为世家也不合适,入列传就可以了。”^⑦这一方面是惑于班固、唐人对“世家”体例的误解,另一方面田先生没有通盘考虑本纪、世家与表的结构性关系,当然更没有注意到《孔子世家》、《陈涉世家》这对组合在公羊哲学历史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司马迁自己对“世家”的定义:“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⑧司马迁并没有在这段话里强调传承的意义。二十八宿与北辰是拱卫关系,三十辐共一毂,形成合力滚滚向前,历史的动与静皆在其中。十六诸侯《世家》之所以以书传代,是因为周天子也在传代,

相辅相成,形成对应。而书写谱系也是司马迁之前就有的传统,一些列传中也有谱系,并非说“世家”必须有谱系传承之意。

从《吴太伯世家》到《田敬仲完世家》十六篇周代诸侯世家,见证了周道兴起与衰弊的全过程。战国四《世家》虽然时代在孔子之后,却也是周朝的一部分。我们再把《太史公自序》中阐述战国四世家的写作理由汇总一下,“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学世家》第十四”,“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⑨四世家的成立完全与拱卫周朝有关,所以他们也和周朝一样属于“通古今之变”中“古”的部分。

孔子创制的义法正是承周道衰弊之后,以待后王,体现的是“古今之变”中的“变”,而要将“变”落实在具体的政治进程中,则有待于陈胜发难。因此《孔子世家》在《史记》中的位置并不是孔子这个人物的历史时间坐标,而是象征着孔子所创制的义法在周、汉历史转变之际的位置。朱东润先生说:“史迁列孔子于世家,特以其立大经大法,为汉制作,虽身系周室之岁时,而功在汉家之社稷。”^⑩有了这些认识,再合观司马迁自述《孔子世家》与《陈涉世家》的写作理由: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⑪结合这两段文字,我们看到了一段由周道衰弊走向秦亡汉兴的大历史,是“古今之变”的核心部分:孔子为汉制法是“变”的一面,体现今文经学中的“受命”义;陈胜首难亡秦是“变”的另一面,是今文经学中的“革命”义,两者相辅而行,为“后圣”的到来开辟道路。朱东润先生论《史记》中的世家体裁:“求其本义,史公但言辅弼股肱,不及他端”,^⑫诚为解义。究

其本质,孔子、陈胜虽非汉人,但都在古今变化之际起到辅弼汉兴的作用。前者诸侯辅弼的周朝时间长,他们的世家也可以在谱系中得到延续。孔子、陈胜处古今变幻之际“变”的时期短,相应世家也未必体现延绵不绝。总之,所谓传承延绵并非司马迁立世家这一体裁的本意。

另外,从司马贞到田余庆先生所主张的陈胜可以入列传的观点,也是忽略了《史记》中本纪、世家、表的三位一体性。如孔子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占有一席,陈胜在《秦楚之际月表》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文本上,世家与本纪各篇独立,世家对本纪所起的辅弼股肱作用,最终是统合在表里得到体现的。

四、余论:公羊学衰微与《孔子世家》失解

综上,我们的结论是:《史记·孔子世家》是司马迁以公羊学说为背景,将孔子为汉制法的政治哲学历史化《陈涉世家》则是体现齐《诗》“革命”说的重要一环,两者都是西汉今文经学的核心内容。通过塑造孔子、陈胜的历史形象,司马迁勾勒了从周向汉这一“古今之变”的具体过程与内容《孔子世家》与《陈涉世家》作为一对组合,负责向读者阐述“古今之变”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的方向应该在哪里。因为孔子、陈胜都不是事实上的号令天下的帝王,所以不可能升等到本纪,而混入列传的话,又体现不出西汉早期经学为这一历史巨变设计的特殊内涵,更无法与《史记》中相应的“表”所要表达的思想构成一致性。在作这个安排时,司马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写作结构上,都是逻辑自洽的,并不像后世学者批评的那样思想混乱、体例不纯。以前不是没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点,但很少有人予以系统梳理阐发,故笔者不揣浅陋,表而出之。

班彪与司马迁的分歧,其实有更深刻的学理背景,今古文之争以及通史与断代史不同的写作意图,都需要认真考虑,限于篇幅只能另文阐发。唐宋以后多数学者在《孔子世家》这一问题上失解,是与史学独立、公羊学衰微同步的。据皮锡瑞《经学历史》总结,南北朝以后措意于《公羊》、《谷梁》的学者就很

少,唐代修《五经正义》,《春秋》取的是《左传》,《公羊》、《谷梁》作为小经有“殆将绝废”的危机,且当时风气重注疏而不重义理。^⑧这是唐代学者如刘知幾、司马贞、张守节等人研究《史记》,却不知司马迁思想基础、学理依据的学术史背景。

朱东润先生说:“尚论古书,课其条例,抑扬迭作,其病有三。或本无是例,强为代立,倘有蹉跌,横肆讥诃,此强人以就我之病一也。或见后起之书,别定新例,追论古作,诋其未合,此强前人以就后人之病二也。”此说最明。所以我们研究《史记》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司马迁自己的思想,哪些不是,哪些是后来产生的思想理念被误挪到前代去了。但朱先生也批评了第三种毛病:“古人述作,但宏大体,至于枝叶,实未尽合,而即斑论豹,岂曰能贤,此强古人之阔略以就今人之文网。”^⑨不知本文所述是否有强古人以就今人文网之嫌,诸大雅君子有以教我。

注释:

①班彪:《班彪传》,《后汉书》卷四十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7页。

②如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就是班说的翻版,见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页。

③后世学者对“世家”的讨论,可参考杨燕起等辑的《史记集评》,《史记研究集成》第六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第129~134页。

④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内篇·世家第五》《史通通释》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39页。

⑤《孔子世家》,《史记》卷四十七,第2297页。

⑥王亚桥:《唐张守节与司马贞同为张嘉会弟子考》,《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另《历史文献研究》2021年第2辑苏芑教授主持了一期“张守节研究”专栏,刊载了熊少聪《张守节行实考》、高树伟《〈史记正义〉作者张守节新考》、周浩贤《唐代吴郡“史记学”研究三题》,有相同结论。

⑦《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王水照主编:《王安石全集》

第六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83~1284页。

⑧李清臣:《史论》,《全宋文》卷一七一二,第7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55页。

⑨黄震:《孔子世家》,《黄氏日抄》卷四十六《全宋笔记》第十编第9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年,第365页。郝敬的观点原见《史汉愚按》卷三,转引自《史记集评》,第412页。

⑩刘光蕘:《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转引自前揭《史记集评》,第132页。

⑪前揭《史记集评》汇总历代关于《孔子世家》的评论,材料相对齐全,可资参考,见该书第410~420页。但其中有两个失误:一是第415页,录林伯桐《史记蠹测》有“滴水李氏乃谓所以称夫子者何其陋也”一语;“滴水李氏”乃宋代李复,编者引王应麟《困学纪闻》以证成之。按,林氏未检李氏原文,为错字本《困学纪闻》误导,《史记集评》编者于此似未察。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一《考史·〈史记〉正误》“《孔子世家》”条,全祖望认为文中“滴水李氏”之“滴”字为阎若璩误改,当据元刊本改订为“淇水李氏”(即李清臣),说见栾保群等点校:《全校本困学纪闻》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70页。按,全说是,李清臣论《孔子世家》已见前引。二是第418页,挂在陆家春名下的那段文字,其实出自廖平《〈史记〉列孔子于世家论》。陆氏《学古堂日记丛钞》卷六“《孔子世家》”条乃誊抄廖平之说。

⑫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五《世家》,“《孔子世家》”条,见《推十书》第2册,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第1248页。

⑬廖平:《〈史记〉列孔子于世家论》,《廖平全集》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97~499页。

⑭林駟:《史学》,《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九,明嘉靖刻本《新笈决科古今源流至论》,第3页A-B。

⑮徐复观:《论〈史记〉》,《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9页。

⑯陈澧、金锡龄选编:《学海堂四集》卷十七,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4册,据清光绪十二年(1886)启秀山房本影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50页。

⑰姜宸英:《读孔子世家》,《湛园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2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56~858页。

⑱袁枚:《释孔子世家》,《随园随笔》卷二,《袁枚全集新编》第13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29页。

⑲黄淳耀:《史记论略·孔子世家》,《陶菴全集》卷四,乾隆

二十六年刻本,第26页B。

⑳何焯:《史记上》,“《孔子世家》”条:《义门读书记》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3页。

㉑董仲舒著,苏舆疏:《玉杯第二》,《春秋繁露义证》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8页。

㉒朱维铮:《历史的孔子与孔子的历史》,《走出中世纪》,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2~239页。

㉓周予同:《纬讖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2页。

㉔唯其是建构,故有不信孔子作《春秋》者,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论《春秋》与孔子的关系,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16页。详细总结参曾亦、郭晓冬:《春秋公羊学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23页。

㉕陈文洁:《司马迁之志〈史记〉之“继春秋”辨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

㉖㉗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974、3976~3977页。

㉘㉙吴忠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4~79、71页。

㉚㉛曾亦、郭晓冬:《春秋公羊学史》(上),第7、252~272页。

㉜皮锡瑞撰,周予同注:《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5~49页。

㉝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989页。

㉞吕思勉:《史通评·世家第五》,载氏著《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4~145页。

㉟此说或渊源于孟子,《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然以《春秋》承《诗》,不具有拟王朝化特征。参焦循:《孟子正义》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72页。与《史记》时代相近的,则有《淮南子·汜论》“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之说。按,中华书局1989年版冯逸、乔华点校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三《汜论训》,将此句中的“春秋”作时代解,不打书名号,恐失文意,此篇上下文论制法、经义者甚多,参该书第431页。刘向《说苑·君道》:“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与《史记》同为公羊说,参向宗鲁:《说苑校证》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1页。

㊱董仲舒著,苏舆疏:《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春秋繁

露义证》卷七,第183~213页。

③⑥董仲舒著,苏舆疏:《奉本第三十四》,《春秋繁露义证》卷九,第279页。

③⑦《孔子世家》,《史记》卷四十七,第2340页。

③⑨曾亦、郭晓冬:《春秋公羊学史》(上),第20页。按,在现存典籍中率先揭示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故治经学史者多注重孟子与公羊学的关系,参同书第24~27页。

④⑩孔颖达:《春秋正义》杜序疏引,参阮刻《重刊宋本左传注疏附校勘记》卷一,嘉庆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学本,第22页B。

④⑫前揭阮刻《左传注疏》卷一,第22页A、第22页B。

④⑬阮刻《重刊宋本公羊注疏附校勘记》卷二十八,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本,尤其注意其中第11页B~15页A。前揭阮刻《左传注疏》卷五十九,第13页A~14页A;阮刻《重刊宋本谷梁注疏附校勘记》卷二十,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本,第15页A~16页B。

④⑭班固:《董仲舒传》,《汉书》卷五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9页。

④⑮司马迁:《孔子世家》,《史记》卷四十七,第2338、2342页。前揭阮刻《左传注疏》卷六十,第1页A、2页A。

④⑯司马迁:《儒林列传》,《史记》卷一百二十一,第3759页。

④⑰相关总结参董仲舒著,苏舆疏:《符瑞第十六》,《春秋繁露义证》卷六,第157页;陈立:《公羊学义疏》卷七十五“哀十四年”,第2898~2899页。

④⑱董仲舒著,苏舆疏:《春秋繁露义证》卷六,第157页。

④⑲前揭阮刻《左传注疏》卷一,第27页B。

④⑳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史记》卷十四,第641~642页。

⑤①如徐复观:《论〈史记〉》,前揭《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206~208页;赵伯雄:《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陈文洁:《司马迁之志》,第24~27页,等等。相关文献尚多,不一一列举。

⑤②董仲舒云:“《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备。”见《玉杯第二》,《春秋繁露义证》卷一,第32页。

⑤③徐仁甫信刘歆伪造《左传》之说,并疑及《史记》这段文字,以为后人窜入,恐是过激之论。徐仁甫《左传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页。

⑤④皮希瑞撰,周予同注《经学历史》,第51页。

⑤⑤曾亦、郭晓冬:《春秋公羊学史》(上),第173~180页。

⑤⑥班固《楚元王传附歆传》,《汉书》卷三十六,第1967页。

⑤⑦陈仁锡《陈评史记》卷四十七,转引自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四十七,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846页;李景星《孔子世家》,《史汉评议》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0~141页。

⑤⑧赵翼《史记三》,《陔余丛考》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6页。

⑤⑨司马迁《陈涉世家》,《史记》卷四十八,第2351页。

⑤⑩陈玉树:《〈史记·陈涉世家〉书后》,《后乐堂文钞》卷一,转引自《史记集评》,第422页《儒林列传》,《史记》卷一百二十一,第3759~3761页。

⑤⑪皮锡瑞撰,周予同注:《经学历史》,第59页。

⑤⑫董仲舒著,苏舆疏:《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春秋繁露义证》卷七,第186~189、198~201页。

⑤⑬因此,司马贞补《史记》,在《五帝本纪》之前加一篇《三皇本纪》,是不理解司马迁原著结构的学理依据。一定要补的话,也应该补《九皇本纪》。但九皇、六十四民,遥远幽渺,名愈高而份愈轻,作历史考察的意义不大,说见前揭《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所以可以说,司马迁以《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开端,体现的正是董仲舒的历史观。

⑤⑭前揭阮刻《公羊注疏》卷二十八,第13页B~15页B。

⑤⑮董仲舒著,苏舆疏:《春秋繁露义证》卷六,第158~159页。

⑤⑯班固:《董仲舒传》,《汉书》卷五十六,第2504页。

⑤⑰司马迁:《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史记》卷六、卷四十八,第345~354、2365~2368页。

⑤⑱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载氏著《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173~174页。按,蒙文通指出,汉代传《齐诗》的第一代学者轅固生,其先人因明《公羊春秋》而为秦博士。据蒙氏自注,这条材料出自《史记会注考证》卷五十五《留侯世家》张守节《正义》所引《陈留风俗传》,参前揭版本总第3097页。检核原书,张守节这条注是为说明商山四皓,蒙氏所谓的轅固先人即四皓中的园公,然张守节引文并未提及轅固,更未明言两者的关系,且这段引文有讹脱,颜师古已讥其为不经之臆说,未知蒙氏别有何据。实则不必如此迂曲,齐学内部会通可见诸经义。张守节这条《正义》在中华书局修订版《史记》中不取。

⑤⑲司马迁:《儒林列传》,《史记》卷一百二十一,第3767页。

⑤⑳《孟子》提到孔子作《春秋》除前举《离娄下》之外,尚见

于《滕文公下》，参前揭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三，第452、459页；革命放杀义见《梁惠王下》，《孟子正义》卷五，第145~146页。

①“原始察终”一语出自《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999页。

②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982页。

③司马迁：《秦楚之际月表》，《史记》卷十六，第915页。

④梁玉绳：《史记志疑》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5页。

⑤⑦田余庆：《说张楚》，《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

局，2004年，第28、2页。

⑥司马迁：《秦楚之际月表》，《史记》卷十六，第931页，注意表格的第一行。

⑧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999页。

⑨⑩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第3988~3989、3989页。

⑪⑫朱东润：《〈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载氏著《史记考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14页。

⑬皮锡瑞撰，周予同注《经学历史》第120、130、148页。

⑭朱东润《〈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载氏著《史记考索》，第10页。

Rethinking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Confucius Family in the Context of Gongyang School

Jiang Peng

Abstract: There have always been many scholars who have questioned and maintained the rationality of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Confucius Family*.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family inheritance of the Duke and Marquis" as the "Family" is an important obstacle to interfere with our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Confucius Family. The key to solving this problem is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that Historical Records is a text deeply influenced by Classics. Since the end of th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re have been many interpreters probing on the writing intentions of Confucius Fami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ring and Autumn, but they are not systematic.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further point out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that in Historical Records, the image of Confucius, who has excellent value due to Spring and Autumn, mainly comes from the Gongyang School taught by Dong Zhongshu. Only through the Spring and Autumn view of Historical Records can we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nfucius view of Historical Records.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Confucius Family* is not a simple historical biography. It form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with Chen She's Family to jointly take the task of explaining the trajectory of historical changes. The description of this historical changes is echoed b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built by the Western Han confucian schools represented by Gongyang School. After the Tang Dynasty, Gongyang school fell into decline. Scholars began to question the rationality of Confucius Family and Chen She's Family, because they began to use pure historical thinking, rather than Classics thinking to understand Historical Records.

Key words: 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Confucius Family*; Gongyang School; Dong Zhongshu